



治学先师 真理卫士

——李达在武汉大学的 13 年

丁俊萍 吕惠东

摘 要：李达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 13 年时间里，注重教育质量的提高，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抵制和反思“教育革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湖北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达与毛泽东论争“大跃进”口号，并对“顶峰论”进行批判和抵制，彰显了一名学者求真求实、坚持真理的秉性。

关键词：李达；武汉大学；高等教育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中，李达的贡献必将为人们所永远铭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法学、史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李达都做出了杰出的成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一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而呕心沥血。同时，李达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长达 13 年之久。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李达带领武大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以武汉大学为平台，奠定了湖北地区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前列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李达以自己的古稀之躯抵制狂热的“左”的错误，并因捍卫真理而惨遭迫害。他把自己的才华和生命永远地献给了荆楚大地。李达留给后人的不仅有等身巨著，更有尊师重教、爱护学生、奖掖后学的师者风范和不畏权贵、刚正不阿、求真求实的学者品性。

一、新中国成立后湖北高等教育的奠基人

1949 年底，热爱教学与科研的李达，婉辞了毛泽东安排他在京工作的好意，主动要求下到地方做一名“教书匠”，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人才。次年 2 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两年后，他又调任武汉大学校长，从此任职武汉大学长达 13 年，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任期最久的校长。他以武汉大学为基地，加强学科建设、发展教师队伍、引进专长人才，为湖北地区乃至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建设亟须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高校承担着培养、输送人才的重任。1953 年，初任武汉大学校长一职的李达就在开学讲话中表明了自己的教育观、人才观。他指出，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第一出发点，要求培养的学生要在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积极学习、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全心全意忠实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①。他根据自身数十年从事教育事业的经验，提出了创办新型高等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的原则遵循，即“首先以马列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

^① 宋镜明：《李达》，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第 239 页。

科学,作为高等学校所必须具备的基础;其次,适应国家经济建设计划所要求的不同部门的不同建设人才,在广博的基础知识之上进行不同类型的专业教育,使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全面发展与专业训练相结合,以培养出对各种建设事业胜任的专家”^①。李达讲话中提出的由博到专、唯才是用、服务于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等原则,实际上回答了教育应培养“全才”还是“专才”的问题,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思想,指明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确立了建设综合性大学的基本方针。

武汉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校院系调整后仅有的14所综合性大学之一。李达上任伊始就清楚地认识到综合性大学和其他专科性的高等学校在社会建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在他看来,专科性或专门性高等学校的任务,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技术科学方面的专门从事实际工作的应用型人才,更注重实践操作;而综合大学的任务则“主要是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②,进而为科教文卫各部门输送专门人才。在此基础上,李达提出了综合性大学的培养目标,其一,“要使学生具有较高深的理论水平与较广阔的科学知识,通晓一般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规律”,理论基础打牢之后再行专业训练;其二,使学生“逐渐养成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研究工作,并善于在马列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解决自己专业方面的某些理论和实际的问题”^③。这一过程要经过系统的长时期的锻炼,如此使学生不仅掌握了学科理论,而且掌握了专业方法,这样就有其自身优势,就业范围比较广。“综合大学所教育的程度比较深,而方面也比较广,学生毕业后就业的范围也比较广,因此培养目标并不因学生就业而有所影响”^④。此处,反映出李达两个极为重要的教育理念,一是基础理论的学习至关重要,要把学生培养成独立思考的个体,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二是不能把学生就业作为高等教育的唯一指向,而应该使学生具备系统的知识和创造精神。这两点,即使在现在看来,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爱才用才、奖掖后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是一所大学重要的资本和标志,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涌现出很多“大师”,如王星拱、王世杰、闻一多、朱光潜等。李达主政武汉大学期间,也极为重视优秀人才的引进和青年人才的培养,力求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师资源,李达认为,“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才行”^⑤,师资力量是提高教学质量、“迎头赶上”的关键因素。他勉励各系主任“找点有培养前途的教师,以三至五年为期,十年、八年在学术界出现几个有地位的。把中级骨干充实起来,希望三至五年之内,十至八年之内,涌现出一批知名教授,要培养一批人才出来。”^⑥李达特别注意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广开才路,到处招贤纳士,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充实学校师资队伍。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度传为美谈:著名化学家、学部委员、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教授,被错划为右派后,别人避之唯恐不及,都不敢用他。李达却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秉着任人唯才的理念,大胆聘请曾昭抡教授到武汉大学任教。曾昭抡教授的引进,在学校起到了发散效应,带动了武大化学系一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科研硕果大量涌现,从此名声大振,这离不开李达不落窠臼识才的眼光和不拘一格用才的魄力。

中青年后备教师力量的培养和储备也是提升学校综合实力的关键。李达高度重视师资培养提高工作,认为“教师的教学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水平,是反映学校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出成品’、‘出人材’的最基本条件”。他强调:“必须把师资培养提高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⑦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中,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原哲学系的教授、副教授全部调出了武大,给办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1956年,时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的李达决定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他在哲学系师资队伍建设上采取了三条办法,“一是亲自到人大、北大去聘请教师,二是依

①李达:《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载《新武大》1953年10月第98期。

②李达:《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载《新武大》1953年10月第98期。

③李达:《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载《新武大》1953年10月第98期。

④李达:《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载《新武大》1953年10月第98期。

⑤《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27页。

⑥《李达文集》第4卷,第725页。

⑦孙祥钟:《深有启示的几次谈话》,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靠武大派到人大、北大学习过哲学的已回校的青年教师,三是继续派青年教师到人大、北大学习”^①。哲学系建立伊始,为满足院系发展对师资力量要求,李达亲自登门到北京大学聘请了一批著名教授,如萧蓬父、陈修斋等,这为哲学系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达作为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的创始人之一,年逾花甲、忍着病痛,亲自邀请中青年教师到武大工作,并关心他们的成长。陈修斋教授后来回忆说:“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我家坐下不久,就感到胃痛难忍,随同他的同志当即送上一包随身带的饼干,他一面就着茶水吃了几片,压压胃酸,一面忍痛和我谈话,原来他是带着一身病痛,在亲自为办学事业奔波!而态度还是那样的和蔼、诚恳、亲切。”^②李达也特别注重对人才的关心,萧蓬父教授回忆,“我患了眼病,老校长拄着拐杖两次到我家里来看我,我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感动”^③。另据武大当时在北京进修的教师回忆,“老校长每次到北京去开会,无论怎么忙,总要把在北京学习、进修的武大同志找到他那里去畅谈”,有时亲自到北大研究生的宿舍里看望进修的武大青年教师^④。李达对青年教师的关爱和提携可见一斑,也正是李达的爱才用才,才使武大的教师能够专心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保证了教学的高质量和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

第三,反思与抵制“教育革命”。

1958年,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革命大批判”等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拔白旗、插红旗”,“政治挂帅、劳动上马”,并以“放卫星”的形式鼓励青年助教和学生大编教材,与成名的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打擂台”;鼓励生产劳动,弱化基础理论教学。高校几乎都把生产劳动列入必修课程,还把一些实验室变成工厂,使学生不是潜心读书而是在工厂中参加生产劳动。这是“大跃进”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与扩展。武汉大学也不例外。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他来到化学系和物理系的校办工厂,“称赞实行半工半读的学生,说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毛泽东在听取学校负责人汇报情况时又指出:“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⑤虽然毛泽东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却对这种违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做法展开了痛苦的反思,对武大的“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直至公然反对。

李达首先对“教育革命”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让教师、学生都参加生产劳动,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否会降低教学质量?对学术造诣很高的教授、专家进行批判,弃而不用,是不是一种资源浪费?等等。李达在初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在一次开学典礼讲话中就表明了自己办学理念,“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一切行政工作都服务于教学工作”^⑥。在李达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必要的,但教学必须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不能本末倒置。而此时,李达发现很多师生竟然置正常的基础理论知识学习于不顾而去参加生产劳动,例如哲学系部分师生曾热衷于单纯劳动,将书本丢在一边,只搞诸如“花生地里出哲学”一类空泛的讨论。面对这种现象,李达极为不满,认为这样做完全背离了正常的教育规律。他批评学校的某些负责人:让学生整天参加劳动,大学就不能称之为大学,“一开口就讲赚了几十万,学校不是做生意的”^⑦。他认为在大学里搞诸如“打倒资产阶级权威”,“拔白旗、插红旗”,“比武”、“打擂台”等政治运动的做法是“胡闹”。他明确指出:“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说打倒权威是胡闹”,“搞革命不能靠空喊,要拿出东西来,要拿出有分量的成品,科学著作要拿到桌子上打得叮当叮当响!”^⑧他还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大家要认真读书,对于开会劳动的事情可以不用理会,为的只是使正常的教学工作不要受到群众运动的干扰。李达的上述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教学、科研与实践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启迪。

经历了“大跃进”的曲折之后,党中央于1961年制定了《高教六十条》。这是当时高等教育领域拨乱

①陶德麟:《李达同志与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重建》,载《珞珈哲学论坛》第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3页。

②陈修斋:《百感交集情李老》,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③《纪念和学习李达同志——哲学系教师座谈纪要》,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④《纪念和学习李达同志——哲学系教师座谈纪要》,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5页。

⑥李达:《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载《新武大》1953年10月第98期。

⑦《李达文集》第4卷,第724页。

⑧参见《湖北日报》1966年6月30日,第2版。

反正的纲领性文件,对高等教育的体制、方针、培养目标、教学方法等都做了规定。对此,李达不仅坚决拥护,而且深入学习领会,并带领全校师生坚决贯彻执行。他明确指出,教育革命把学校的教学秩序、规章制度搞乱了,整个学校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这种状况必须做出改变。他明确要求立即纠正由助教担任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的荒唐作法,并强调“要重视基础课,要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要行政恢复那些规章制度,搞教学计划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①。正是在李达对“教育革命”的坚决抵制与深刻反思下,武汉大学的教学秩序得以逐渐恢复并又迅速步入正轨。至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与“造反派”的暴力行径,已经不是李达这样一介文弱书生所能抵抗的了。李达率直的性格和爱校爱生的责任意识,也使他成为那个大动乱年代中最早的一批受害者。

二、狂热年代真理的捍卫者

李达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更是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时刻关注社会发展,并运用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尽力去扶正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理论认识的方向。

第一,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许多地方提出一些违反常识的口号。当时的武大学生到基层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了“宁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标语。李达听闻这两条标语,认为前者表示群众生产的热情和决心,害处不大,而后者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这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会危害人们的生产实践,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需要条件的,否则会陷入唯意志论。

是年9月11日,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途中到达武汉,李达匆匆赶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客舍。他省却了寒暄与客套,直接向毛泽东发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到底说不得通,行不行得通?毛泽东问明来意后,不慌不忙地说,这个口号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具有两重性,主要在于鼓励群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列举了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主观能动性取得胜利的几个例子加以说明。然而,李达并不赞同。他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并追问道:主观能动性是不是可以无限大呢?毛泽东见李达非究根到底不可,便生气地说道: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李达也气冲冲地说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总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他仍在耐心地劝说毛泽东:“现在的人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李达越说越激动:“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李达走后,平复下来的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今天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②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大哲学家,不可能不知道上述口号的唯心主义错误。只是,他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哪怕这种热情、这种主观能动性看起来有点脱离实际,他也不会给群众泼冷水,而且会批判给群众泼冷水的人。而此时的李达不惜冒犯和顶撞领袖,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反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真理的执著。而毛泽东在事后主动承认了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发热”的头脑起到了冷却的作用。李达在这一论争中的表现,又一次显示出了他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品性。

第二,抵制马列主义的“顶峰”论。

伴随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开展,个人崇拜之风迅速蔓延,表现之一就是“顶峰论”的出现,即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论”首先由康生提出,林彪则将其发挥到了极致。1960年10月,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

^①《李达文集》第4卷,第724页。

^②参见谢红星、梅雪:《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4~185页;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9~412页。

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①。如此猛烈的个人崇拜之风下,大多数人都极度狂热。此时的李达,正带病坚持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不可避免地要对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列主义的发展进行一个全面的论述。正因为如此,李达与鼓吹“顶峰论”的林彪、康生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李达看来,应该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论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赞成把马列已经讲得很透彻的理论也说成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的东西。他说:“讲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讲得很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是发展。到处都是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淹没了。”^②李达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从学理上批判了“顶峰论”的荒谬性。

“文化大革命”前夜,李达仍在为抵制“顶峰论”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显得力量单薄,但他与众多在狂热中仍保持理性、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一道,为使这个国家少受磨难而燃烧着自己最后的光和热。

1966年1月,“顶峰论”已成为个人崇拜之风下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报纸刊物上也在大肆宣传。李达的助手在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系列文章时,提出是否要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这种想法立即遭到李达的严厉批评。据陶德麟回忆说:“一九六六年三月以后,林彪的‘顶峰’论在一些报纸上大肆宣扬起来。他忍不住了。他坚决不同意,公开地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吗?’有人当场提醒他:‘这是林副主席讲的呵’!他坚定地回答:‘我知道,我不同意!’‘顶峰这个说法不科学、不合乎辩证法嘛。’”^③在李达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应该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如何能存在顶峰呢?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谁说的,都不能同意!这些本来是真理性的认识和言论,在“左”的狂热背景下,却成为李达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因而被打倒、被批斗的最“过硬”的“定性材料”。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持,对“顶峰论”的抵制和反对,彰显出其真理卫士的本色与秉性。1966年8月24日,76岁的李达,本身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肺气肿和胃溃疡等多种疾病,在经过无数次的批斗,又不允许亲人探望和医生治疗的情况下,最终撒手人寰,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1980年,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的决定。一生为捍卫真理而斗争的李达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回顾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13年,他在教育领域,始终坚持以教学为根本,以学生为主体,不断引进人才、奖掖后学,对高校中的“左”的错误,尽自己最大努力进行抵制,为武汉大学,也为湖北高等教育保留下了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发展的骨干力量。在理论界,李达作为一个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始终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和认识的唯一标准,抵制错误,捍卫真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李达不愧为一代治学先师,真理卫士。今天的武汉大学校园内立有李达的雕像,四周绿树成荫。清晨傍晚,学生在“李达园”中读书;节假日,游人在李达雕像前拜谒。这既体现了武汉大学师生对李达老校长的学术和品格的敬重,也凸显出武汉大学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人文精神。

●作者地址:丁俊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jpding8895@163.com。

吕惠东,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62);中央高校(武汉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转引自谢红星、梅雪:《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第214页。

②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载《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16页。

③陶德麟:《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载《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第216页。